

文化生态与

文学发展 (1920—1928)

WENHUA SHENGTAIYU

周海波 等◎著

WENXUE FAZH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生态与

文学发展 (1920—1928)

WENHUA SHENGTAIYU

周海波 等 著

WENXUE FAZH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生态与文学发展: 1920~1928 / 周海波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161-5619-3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1920~1928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7451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一明
特约编辑 齐继军
责任校对 闫幸
责任印制 何艳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87千字
定价 5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多元与对话：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化生态	(1)
一 “五四”问题困扰的 20 世纪 20 年代	(1)
二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学生态	(7)
三 后《新青年》时代的文化路线图	(15)
四 “五四”再评价及其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化倾向	(28)
第二章 现代传媒与《学衡》的命运阐释	(36)
一 《学衡》的选择与无奈	(36)
二 《学衡》与现代传媒精神的冲突	(48)
三 反思：《学衡》的现代命运	(60)
第三章 消费文化时代的传媒与文学	(73)
一 《红杂志》、《红玫瑰》与文学场的构建	(73)
二 《红杂志》、《红玫瑰》的市民化散文品格	(80)
三 《红杂志》、《红玫瑰》的红色世界	(82)
四 《红杂志》、《红玫瑰》的游戏趣味	(97)
第四章 挣扎于经济与社会压迫之间的创造社	(109)
一 作为文学场构建中的创造社	(109)
二 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现代传媒与创造社的成立	(120)
三 策略与运作——现代传媒与创造社的崛起	(132)
四 陷落与流散——现代传媒对创造社的影响	(146)

第五章 《新月》：纸上的沙龙	(155)
一 《新月》的沙龙文化渊源	(155)
二 《新月》的沙龙文化本质	(179)
第六章 文学史意义上的柔石	(186)
一 作为文学史标本的柔石	(186)
二 文学生产商品化环境里不动摇的文学追求	(195)
三 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柔石创作	(200)
第七章 传媒文化与现代话剧	(217)
一 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戏剧文体确立	(218)
二 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戏剧舞台和文本	(229)
三 现代传媒与戏剧观念的转变	(242)
参考文献	(250)
后记	(252)

第一章 多元与对话: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化生态

20 世纪 20 年代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文学史意义的研究对象,它只是一个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文学史的某个阶段。从 1902 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到 1917 年胡适、陈独秀提倡“文学革命”,中国文学在“新”与“旧”、“现代”与“古典”的矛盾对立中不断发展,演绎出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尤其在“五四”时期,在西方思潮及其现代传媒的影响下,文学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不同的文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比较集中地表现着。但是,随着《新青年》的分化,随着《小说月报》的改刊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文学又出现了新的文学现象,表现出新的特质,对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研究这一时段的文学,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本课题的任务在于将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学和现代传媒作为两个关键词,在几个重要文学现象的研究中,考察现代传媒对这一时段文学生态的制约以及文学发展出现的新的问题。

一 “五四”问题困扰的 20 世纪 20 年代

20 世纪 20 年代,是“五四”运动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也是承接“五四”所提出的诸多命题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也与“五四”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化生态,往往是通向中国现代文化各个层面的一个重要途径,而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态又往往无法回避“五四”,也可以说,20 世纪 20 年代是一个被“五四”问题所困扰着的时代。

在中国现代文化及其文学的研究中，“五四”、“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五四文学”等，是被人们广泛运用的文化史或者文学史概念，对“五四”时期文学的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学术成果最多的阶段之一，也是最受关注的文学历史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五四”及其文学的不同解读，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诸多理论问题及文学的原点问题，都可以在“五四”这里找到答案。但是，“五四”及其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甚至“五四”的时间界限，都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不确定的概念，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情感认同和精神归宿地，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其进行必要的厘定。比如说，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的近十年时间，就往往被人们简单地划归为“五四”时期，一些文学史著作将之作为“五四”或者“五四文学”进行论述。而对“五四”文学的确认又总是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确认联系在一起，以“新文学”为文学史的本位，以“新文学”代替中国现代文学，也正是从对“五四”的评价开始的。

实际上，“五四”及其文学从其开始就受到学界的不断质疑和反对，各种声音此起彼伏，肯定与否定“五四”的观点同时存在。与此同时，来自新文化阵营外部的和内部不同力量，从不同方面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学理上和情感上的批判。从林纾反对《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到《学衡》反对新文化运动，从《甲寅》的“复古”到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从鲁迅等人对“五四”的再思考，到新月派对“五四”文学的理性审视，“五四”一直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风口浪尖。这一问题一直带进20世纪20年代，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困扰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若干争论，既是“五四”问题的延续，也是20世纪20年代突出的文学现象。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而《学衡》杂志及学衡诸公的文化活动也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文化生态的重要内容。应当说，正是“五四”问题的困扰，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必要的讨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学才能走向多元形态，在不同观念和不同流派的交锋融合中，建立起健康的文化生态，形成良好的文学生存环境。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新文学”发展为主导的多种文学并行存在，并在竞争中发展的局面。沿袭古典文学以及王国维美学思想发展而来的古典主义形态的文学仍然是这个时期文学的客观存在，不仅学衡派诸公坚守着古典

主义立场，而且具有传统文人特点的一些作家、学者也仍然是古典主义文学的主要力量；同时，在现代商业文化浪潮和现代传媒基础上出现的都市流行文学，诸如《礼拜六》、《红》、《紫罗兰》等杂志及其文学，为城市文化及其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足够的文学商品。

不过，无论古典主义文学还是都市流行文学，都已经无法与新文学相抗衡了。“五四”新文学所带来的文学问题成为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不能绕过的核心问题。

当然，“五四”命题在“五四”时期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不可能看得清楚，也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在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将目光推后一点，能够留出更多的空间可以从容地回味“五四”余韵及其 20 世纪 20 年代的问题。这里，笔者选取《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研究“五四”问题及其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参照。

“五四”新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是到 1935 年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时，才真正合法化并得到历史确认。《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一部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总结性选本，具有文学史的叙述功能和历史定位功能。赵家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前言”中说：“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从民国六年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由胡适陈独秀等发动后，至今已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时间，比起我国过去四千年的文化过程来，当然短促值不得一提，可是它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使命，正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正是一切新的开始。它所结的果实，也许及不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般的丰盛美满，可是这一群先驱者们开辟荒芜的精神，至今还可以当作我们年青人的模范，而他们所产生的一点珍贵的作品，更是新文化史上的至宝。”^①由此可以看到，赵家璧作为“大系”的主编，是非常看重这套书的文学史价值意义的。赵家璧是一位对新文学有深刻认识的资深编辑，他独特的眼光和胸怀，看到了“五四”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且包容了新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态的存在。因而，他不是从一般作品选本或者作品丛书的角度去组织这套“大系”，而是从文学史建构的角度对已经过去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学，进行一次文学史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从而通过“大系”这一特定的出版方式对“新文学”进行定位，建构文学及文学史的新秩序。从“大系”的构成来看，全书十卷，包括了理论建设、文学论争、

^①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年版。

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资料索引等，文类全面，具有权威性，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五四”新文学的面貌。

胡适选编的《建设理论集》是“大系”的第一部，也是具有纲领性的一部。这部《建设理论集》与胡适自认为对赵家璧的邀请“我当然不能推辞”^①有关，也表明主编者已经意识到胡适及其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是建构一部文学史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胡适看来，中国新文学首先就是理论上的建设，没有新文学的理论也就没有新文学的产生。对此，刘禾曾经评论说：“在这里，理论在一个话语领域里扮演了合法性角色，在这个话语领域长期的象征资本是一种比金钱更好的投资。”^②赵家璧邀请胡适主编《建设理论集》，不仅因为胡适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新文学理论的建树者之一，而且也是因为这部选集的重要性。这部《建设理论集》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上确立了整部大系的基本思路，为“新文学”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和观念性的框架。胡适本人也高度重视这部《建设理论集》，他不仅按照编辑体例选编作品，撰写“导言”，而且特意撰写了长文《逼上梁山》，回顾和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重要的理论文献。胡适在《导言》的开篇有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良友图书公司的《新文学大系》的计划正是要替这个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作第一次的史料大结集。这十巨册之中，理论的文学要占两册，文学的作品要占七册。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固然是史料，这七大册的小说，散文，诗，戏剧，也是同样重要的史料。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创作有了一分成功，即是文学革命有了一分成功。‘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正如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那个新社会秩序的成败即是那个政治革命的成败。文学革命产生出来的新文学不能满足我们赞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产生更满意的社会秩序一样，虽有最圆满的革命理论，都只好算是不兑现的纸币了。所以我是最欢迎这一部大结集的。”^③胡适的这一番话至少表明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是不容置疑的，不用再讨论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和理论实践以

①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页。

② 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0页。

③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2页。

及用活的语言创作出的活的文学作品，都是历史的材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合理的存在，是值得记录和书写的；第二，历史的材料虽然是客观的存在，但必须要经过历史学家的整理才能够形成应有的历史的形态，才具有历史的价值；第三，对史料的整理不是为了结集材料，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大系”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史料，而且通过史料的结集重构新文学的秩序。这就是“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

从《大系》的选编者对新文学的认识来看，他们中的部分人主张划分出一个完整的“五四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新文学也就是“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所选编的就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理念与创作。阿英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的序言中，提出以 1919 年 5 月 4 日作为开端，1925 年 5 月 30 日作为结束，构成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时期。郑振铎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认为“民六到民十”即 1917 年至 1921 年，是一个完整的时间段：“‘五四’运动在民七，文学革命则起于民六。故‘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以及其后三年均归入此时期。”^①茅盾本人也曾经说过这样的意思，“五四”时期应该是指 1919 年“火烧赵家楼的前两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②。从这几位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的编者的观点来看，在他们编选《大系》之前，都认可“五四”新文学基本上就在 1917 年到 1921 年的这个时期。但是，为什么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这些曾以提出分期观点来的编者又不同意这个分期，而提出另外的分期方法？就是茅盾本人也是最激烈反对这个观点的人。可见文学史分期尤其对“五四”分期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文学史的书写。

在选编“大系”的过程中，茅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茅盾并不是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作家、理论家，茅盾进入文坛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表文学批评文章开始的。当他进入文学界的时候，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茅盾仅仅是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个尾巴。显然，如果采用 1917 年到 1921 年为新文学的分期方法的话，就很难包括进后起的文学研究会等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学。茅盾就曾在给赵家璧的信中说：“‘五四’是 1919 年，‘五卅’是 1925 年，前后六年，这六年虽然在新文学上好像热闹得很，其实作品并

^① 郑振铎：《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郑振铎选集》（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56 页。

^② 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文学导报》1931 年 5 月第 1 卷第 2 期。

不多。弟以为不如定自‘五四’到‘北伐’，即1919年—1927年，如此则把现代中国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到‘北伐’，‘北伐’到现在。……本来‘五四’到‘五卅’不过表示了‘里程碑’，事实上，第一本的‘建设的文学理论’，就有许多重要文章是发表在‘五四’以前。从1917年到1927年，十年断代是并没有毛病的。”^①茅盾的观点不仅考虑到了文学的因素，而且考虑到了其他的因素。他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出发，看到了“作品并不多”不宜于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问题。但是，茅盾对文学史分期的重心仍然在“五四”以来中国革命史上，以政治发展史作为文学发展的分期依据。赵家璧采纳了茅盾的观点，将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作为一个历史分期，作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段。对此，赵家璧曾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中作过比较详尽的叙述和分析：

中国新文学自从民国六年（1917）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已近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时间，比起过去四千年的文化过程来，当然短促得不值一提；可是它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使命，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正是一切新的开始。二十年中所获得的成绩，也许并不足以使我们如何的夸耀，可是这一点小小的成绩，正是来日大丰收的起点。

这二十年的时间，大约可以分做两个不同的时期：从民六（1917）的文学革命到民十六（1927）的北伐，从民十六的北伐一直到现在。前一时期的新文学，继续着五四运动精神，到北伐成功，便变了一副面目；后一时期的新文学，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目前既不准替它随便作结束，为事实上便利计，我们先把民六的文学革命到民十六的北伐，这整整的第一个十年间，所有文艺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成绩，做一次整理的工作。

事实上，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各位选编者基本上遵从了这个分期原则，即从1917年到1927年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史时期，文学论争、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各种文体的选编，都照顾到了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历史

^①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忆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8页。

发展及其代表作家作品。只有胡适选编的《建设理论集》是根据本卷的内容和特点的要求而局限于“五四”时期。

《中国新文学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这是对新文学进行文学史确认的手段之一，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 1917 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现在看来，由于从 1917 年到 1927 年正是新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十年文学的过程也正是中国文学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

历史往往是在不断地叙述中确认并为后人接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分期方法首先得到了蔡元培的承认。他在《大系》的“总序”中说：“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时间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斐）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应运而生啊！”蔡元培的目的非常明确，这个分期就是以后中国文学史分期的示范，有了这个示范，既可以确立“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史位置，而又可以为后来的文学定一个标准，使中国文学的新秩序得到认可。随后，李何林也接受了《大系》的分期方法，他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中，比较完整地接受了这一分期观点。李何林在这部著作中，将 1917 年到 1937 年的“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以三个比较有代表的社会革命的事件进行了分期处理，“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大革命时代’前后的革命文艺运动”、“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艺思潮”，这一文学史分期基本上采用了《大系》的分期方法，即按照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发展进行分期，再次确认了新文学的历史地位，确认了“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后，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中，其文学史分期基本上是采用这一观点，并最终形成了新文学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

二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学生态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20 世纪 20 年代是值得期待的。一方面，新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 20 个年头儿，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现代文学的各种文体得到进一步确认，并成为现代传媒的主要文体，同时也初步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作为文学载体的报纸杂志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也已经有了四五年的发

展时间，白话语言成了全国中小学使用的语言，白话文学已经成为文学的正宗。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有理由对未来的文学抱有更高的期望。

1920年又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划分出一条界限。

1920年，随着《新青年》南下上海，作为围绕这份同人杂志而存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开始发生分化，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力量，在杂志向何处发展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此后，虽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努力，也没有挽回《新青年》分化甚至分裂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的分化使这份中国文化界影响巨大的综合刊物逐渐失去光彩，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直接关系2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发展，关系现代传媒在分化与竞争中的新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青年》之后的20年代思想文化界，尤其是作为思想文化评论出现的各种文化周刊，构成了现代传媒最亮丽的风景^①，并演化为值得关注的“后《新青年》时代”的文化特征。

（一）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

20世纪20年代，只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令人关注的、具有特定的学术研究意义的时代，一个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时间段落，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历史学意义。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时代，正如有的学者所说：“2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时期之一。”^②这种兴趣可能主要来自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政治格局的变化无常，以及这个时期所蕴含着的丰富的内涵。

“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各种政治势力、军阀派系形成对峙状态，各种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交汇一起，各种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各式人物相继登场，演绎着现代中国的一幕幕大戏，正剧、悲剧、喜剧、闹剧，应有尽有。不妨先看一下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

1920年3月31日，由李大钊组织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这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创办《共产党》月刊和《劳

^① 据张静庐的统计，从1919年至1927年，全国出版的各种周刊达122种，除这里较多提及的，其他还有如《甲寅》、《狂飙》、《文艺周刊》等。见静《1919—1927年全国杂志简目》，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②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页。

动界》周刊，随后，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 年 1 月 4 日，沈雁冰、周作人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6 月，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发起的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一年，大地震不断，2 月 20 日，甘肃灵州发生大地震，2 月 22 日，甘肃平罗发生强震，3 月 19 日，香港发生剧震，4 月 12 日，甘肃平凉等地发生大地震，7 月 13 日，内蒙古清水河发生地震，8 月 30 日，青海西宁发生大地震，9 月、10 月、11 月，四川、陕西、福建等地分别发生程度不同的地震。

1922 年 1 月，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开始试行。4 月 28 日，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张作霖自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落堡，率 12 万名奉军官兵发动总攻击，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双方在马厂、固安、长辛店激战。

1923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1 月 2 日，中国国民党公布《党纲》。《党纲》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两部分，阐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2 月 4 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震惊中外的大罢工，2 月 7 日遭到中国直系军阀吴佩孚武力镇压。8 月，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10 月 20 日，由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主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

1924 年 10 月 23 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军阀混战的局面进一步升级。11 月 5 日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4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岛日本纱厂 1 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1 月 2 日，孙传芳打败奉军，控制了苏、浙、皖、赣、闽五省。

1926 年 5 月 20 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5 月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8 月 6 日，《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惨遭张宗昌杀害。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9 月 9 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本年度胡适、徐志摩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

1928 年 6 月 4 日，发生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专列行至沈阳城郊皇姑屯车站的铁桥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指挥日本工兵引爆预埋的炸药，张作霖重伤，抬回后气绝身亡。

1929 年 5 月胡适发起人权运动。7 月 26 日，南京政府颁布《大学组织

法》。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党籍。1929年，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即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最久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在思想文化界，同样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新青年社的分化以及现代传播媒体的迅速发展，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应，文化发展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一方面是新文化在激烈批判“旧文化”的过程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都市流行文化在各种力量打压下的顽强生存。同时，报纸、杂志在现代印刷技术的带动下，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电影从无到有，从无声到有声，剧院、电影院、广播通讯、游艺场所、图书馆、阅报栏等开始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仲富兰在《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史（1840—1949）》中说：“民国创建以后，公共文化事业因政府的着意提倡和社会力量的推动，更加成为诸多公共事业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其设施、场所的建造，常常被列为市政建设的重点项目。”^①

刚刚在中国出现不久的电影，这一时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从1905年到1920年，中国所有的影片数量不过20余部，而1921年到1931年间则生产了约650部影片”^②。1921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拍摄了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新闻纪录片，成为中国新闻纪录片的开端，1922年上海影片公司的《海誓》成为中国最早的故事片。诞生于1923年的电影《孤儿救祖记》、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都是这个时期叫好又叫座的电影。1923年上海第一家电台“奥斯邦电台”开始播音，看电影、听收音机、看马戏、进舞厅成为那个时代大都市的“洋娱乐”。

（二）报刊的发展

颜浩在《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团体：1920—1928》一书中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报章杂志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③ 尤其进入20世纪的20年代，报纸杂志的作用已经为社会各界充分认识，现代传播媒体已经成为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内容之一。

尽管有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一过，期刊就显得有些零

^① 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史（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② 张繁文、韩雪松：《中国时尚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③ 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团体：192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落。虽然还有些期刊，但失去了往日的势头，影响也不那么大了。”^① 如果仅就《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关系而言，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各种报刊很少能够有与其相比的，但就整体情形而言，无论报刊数量还是其社会影响力，都有了较大的发展。1921 年是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的第一个年头儿，也是《新青年》分化后知识分子重新组合、新文化进入新的轨道的第一年，也正是在这一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并改刊了《小说月报》，随后又创刊了《文学旬刊》。与此同时，已经消沉一段时间的都市流行文学期刊再次出现一个兴盛的局面，1920 年冬，由范君博、郑逸梅等编辑的《游戏新报》在上海创刊，周瘦鹃、赵苕狂等人主办的《游戏世界》也于 1921 年夏季创刊，影响一时的由周瘦鹃编辑的《半月》也于 1921 年 9 月创刊。就在这一年，《星期》、《东方朔》、《新声杂志》、《小说新潮》、《滑稽新报》等也相继创刊。有意思的是，早已中断五年的《礼拜六》也在 1921 年 3 月复刊。而已经在文坛上确立了地位的一些报刊如《申报》、《大公报》、《晨报》、《京报》、《时事新报》等仍然活跃在文坛上，成为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此后，新文化与流行文化的报刊在竞争中不断涌现，如《学衡》、《努力周报》、《国闻周报》、《甲寅》、《现代评论》以及文学类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浅草》、《沉钟》、《语丝》、《莽原》等，而流行文化刊物如《快活》、《心潮》、《星期》、《红杂志》、《红玫瑰》、《紫罗兰》、《良友》等，据统计，从 1922 年到 1929 年，创办的各种都市流行刊物就达 46 种之多^②。

围绕报刊形成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文化界的多元竞争的格局，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主流文化报刊解体，一方面则是新生传媒如此的兴盛，传统的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的媒体与新起的媒体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一方面是新文化、新媒体，是与现代启蒙运动密切相关的诸如《努力周报》、《语丝》等思想解放的媒体，一方面则是市场化、流行性的被市民读者所接受的诸如《红杂志》、《紫罗兰》一类的媒体。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界形成了以下几种对立而又相互融合的态势：一是“新”文化内部的不同文化力量的对立。《新青年》的分化实际上预示了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再难以坐在一起商讨中国新文

① 周蕙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5 页。

② 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7—610 页。

化的问题，或如鲁迅所说，“五四”退潮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还在继续前行。陈独秀带着《新青年》南下，并将其改刊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胡适则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以《努力周报》提倡他的好人政府的同时，努力于解决中国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鲁迅则另立山头，寻找自己的位置。二是“新”与“旧”的对立。1922年《学衡》创刊，对提倡新文化者提出批评，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新”与“旧”的矛盾表面化、尖锐化，现代文化的“激进”与“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三是“雅”与“俗”对立，《小说月报》的改刊不仅通过现代传媒及其文学组织的方式稳定了“新文学”的地位，而且直接将已经具有广泛读者基础的都市流行文学或曰通俗文学置于对立面，而《礼拜六》的复刊以及《红杂志》、《紫罗兰》等刊物的创办，正是为了表明这一传媒力量的文学态度。

文化从现代传媒的发展来看，各种文化势力正在适应新兴媒体的文化特点，积极运用传媒的力量重新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之路。

（三）文人社团的发展

鲁迅在描述“五四”运动退潮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时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①事情可能并非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悲观。“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较之“五四”时期，更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振臂一呼的英雄少了，但团体的势力却逐渐壮大。

“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主要围绕着现代大学和报刊媒体进行重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现代大学，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条件。以大学为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是从“五四”之前的北京大学作为发端的。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循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广泛招揽人才，形成了大师汇集的令人神往的局面。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等“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几乎都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过。“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不再以北京大学独尊的多

^①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